“瘦身”促“健身”实现“脱胎换骨”

公安机关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持续推进

◆ 理顺职能职责再造流程完善机制
◆ 减少指挥员增加战斗员提升效能
◆ 实现专业更专合力更强基础更实
◆ 科技赋能制度保障持续健康改革

法一线调查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派出所基础警务工作不断夯实，辖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攀升……谈到这两年的工作，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公安局始阳派出所教导员陈铖一脸喜悦。成绩的取得，与天全县公安局大力推进的“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息息相关。

近年来，公安机关不断深化警务体制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推行“大部门、大警种”制，以“瘦身”促“健身”，机构设置进一步优化、职能划分进一步明晰、警力编制进一步下沉，公安机构职能体系得到系统性改善和全方位升级。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四川、陕西、内蒙古等地公安机关及专家学者，深入了解“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进展成效。

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就是围绕公安机关主要法定职责，整合归并现有责权不明确、职能交叉分散的部门机构，进一步理顺职能职责，再造工作流程，完善运行机制，实现工作清单化、一体化管理，无缝化对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魏永忠告诉记者，这一改革的问题导向明显。

天全县公安局政治委员张宁军认为，基层派出所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原警务模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违法犯罪形势的变化，原警务模式表现出“三个不适应”。

“首先是原派出所与城区交警中队、特巡警大队、刑警中队分工过细，与警务实战需求不适应。由于缺乏科学统筹和联勤联动，导致警力浪费、质效不高。”张宁军说，派出所与特巡警大队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无法在辖区重点部位以及案件高发地段形成有效的震慑及合力。

其次是原派出所勤务模式僵化单一，与繁重的警务工作不适应。“拿城区派出所来说，值班备勤任务繁重，社区民警值班后还要承担大量基础性工作，牵扯住大部分警力，导致各项工作无法下沉，基础防控薄弱。”张宁军说

“原警务模式消耗了民警大部分精力，以致干事创业激情不高、缺乏工作主动性，不适应队伍发展。”张宁军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机构设置过多、分工过细、警力资源分散……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公安局局长卜连海告诉记者，面对原有工作体制机制存在的各种问题，包头市公安局以改革为契机，努力打破原有部门领导管理体制，建立扁平化指挥体系，进一步压缩指挥层级，减少“指挥员”、增加“战斗员”，不断优化警力提升效能。

构建新型警务运行机制

依托“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试点，始阳派出所构建了派出所警务运行新机制。

陈铖介绍说，改革后，交警中队、刑警中队整合到派出所，充实人员力量，在此基础上整合有限资源，建立办案队、社区警务队、治安交通巡逻队、勤务指挥室，立足实战要求调整优化职能。

按照“社区专职化、案件查办专业化、巡控实战化、勤务指挥扁平化”的“四化”目标，始阳派出所在值班勤务中创新采用“1+2+N”模式，即“1名带班所领导+两名民警+N名辅警”，定岗不定人，进一步优化派出所警力。

在陕西，铜川市公安局新区分局精简机构设置、优化警力配置、完善勤务机制，切实提升了警务实战效能。

铜川市公安局新区分局局长王东告诉记者，新区公安分局打破警种壁垒，优化警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推向一线、推到实战岗位，将原来的14个机关科室、直属大队整合为“三队两室一中心”6个部门警种，即治安管理大队、刑事犯罪侦查大队、巡特警大队、警务保障室、政工监督室、合成作战指挥中心。

机构设置中突出治安管理、综合执法，形成“大治安”效应；突出打击破案，实行重大案件警力在刑侦部门内部统一调配，形成“大刑侦”效应；突出巡逻防控、维稳反恐，形成“大巡防”效应；突出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及执法监督保障，形成“大保障”效应；突出队伍教育、督察管理、监督执纪，形成“大政工”效应；突出指挥调度、综合研判、合成作战，形成“大指挥”效应……改革让新区公安分局有效解决了部门职能交叉、指挥层级叠加等问题，整合优化了警力资源，精简了机关警力，推动警力下沉。

“分局机关部门警种减少57%，机关及直属单位警力下沉10人，派出所警力由原来总警力的41.3%提升到45%，实现小机关、大基层。”王东说，新区公安分局以“三队两室一中心”为依托，建立健全警务运行机制，做到专业队伍更专、警种合力更强、基层基础更实，实现“1+1>2”的效果。

包头市公安局结合自身实际，精简整合原有的机关内设机构，将职能相近、具备整合条件的部门整合为一，精简率达35%。同时，统一规范设置各旗县区公安机关内设机构，做到机构“瘦身”。

“警务改革‘瘦身’是过程，‘健身’是目的。”卜连海告诉记者，针对部分原企业公安转制的治安分局，因社会治安形势转变、企业保卫组织日渐成熟，公安保卫职能日渐弱化、工作效率不高，决定将部分治安分局调整为直属侦查分局，赋予其新的打击职能，实现对治安分局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切实解决了部分警种专业力量薄弱、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

此外，针对交管支队体量大、下级机构覆盖面广的特点，包头市公安局将原公交分局负责的全市公共交通领域刑事治安案件的查处打击和行业治安管理职能划转至交管支队，并为交管支队加挂包头市公安局交通治安管理局的牌子，实现交管支队一警多能，全市公安机关警力得到“无增长改善”。

警务改革效果初步呈现

2018年四五月间，天全县公安局城厢派出所辖区盗窃柴油案高发。城厢派出所在“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运行模式下，通过全新高效的信息收集、研判模式，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整合情报信息，开展联动协作。

5月，城厢派出所抓获徐某、杨某等4名盗窃柴油犯罪嫌疑人，成功打掉系列盗窃柴油犯罪团伙，破获关联案件10多起，追回被盗柴油2000多升。

这是天全县公安局改革优化警务模式的一个缩影。与此同时，始阳派出所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陈铖告诉记者，改革后，始阳派出所便民服务卡、网上预约等一系列便民措施得以更好地落实；交通事故和可防性案件发案率逐年下降；近3年来，辖区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均呈连续同比下降趋势，服务群众“零距离”、矛盾纠纷“零积压”，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上升，始阳派出所跻身全省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之列。

“改革后，各部门各警种职能更加清晰化，警力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警务机制运行更加高效，成效突出。”魏永忠说。

魏永忠告诉记者，“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在基层推进力度较大，去年以来推进速度明显加快，下一步应有更多新探索和新成效。

“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要及时进行调研检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同时要注重科技应用，以科技力量为改革赋能，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确保改革持续健康深入推进。”魏永忠说。

法院执行完成从『车轮』到『键盘』之变

□ 本报记者 赵婕

正式启用广州5G智慧法院实验室，首次发布5G智传笔、5G随身云盒、5G庭审本和5G-LIM系统4项创新成果，3月26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出系列创新之举，不仅有效提升了庭审质效，更让法院执行工作如虎添翼。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不断创新案件执行工作模式，运用大数据资源、区块链技术建立智慧执行平台和全国法院上下一体横向联通的执行指挥管理机制，完成从“车轮上执行”到“键盘上执行”的变革。

系统联通

宽大的屏幕上跳动着不同颜色的数字，实时呈现全国法院执行办案动态，工作人员则在屏幕前忙碌着……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的工作场景。

这块屏幕联通着全国四级法院的执行指挥中心，可以实时监控财产查控、事项委托、执行质效等9大业务版块，统筹管理督办、指挥、会商等工作。

最高法执行局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说，最高法执行指挥中心日常主要对显示的终本案件（**指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裁定终止本次执行程序的案件**）和超期案件进行督办，每起案件的流程都会显示在大屏幕上，每起案件的承办法官、申请人、进展程度清晰可见。

“指挥中心平台可供全国各级法院进行事项委托申请。”最高法执行局相关负责人说，以前异地执行时，至少要派出两名法官和当地法院的协助，耗时耗力。有了这个平台，异地查封账户、房产等工作只需在平台上发起委托申请，请当地法院代办后将相关司法文书上传至平台即可。

去年以来，疫情给异地执行带来诸多困难，全国法院广泛运用平台事项委托系统，积极开展异地委托执行，一大批跨域案件得以执结，取得良好效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某起案件时，发现被执行人在海南有一套房产，但安排执行法官赴海南查封需要联系当地法院，将花费不少时间。西城区法院在平台上发出委托申请，最终，海南当地法院代替完成查封任务，为这起执行案件画上圆满句号。

据了解，2020年，全国法院发起事项委托133.6万件，期限内办结率98.7%，平均办理用时5天，免去至少260万次异地出行，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智慧执行

为更好地保障执行工作，最高法从执行法官现实需求出发，加快推进“移动执行”App升级为“智慧执行”App。从2020年2月3日起短短3周内，全国法院指挥中心实现执行GIS指挥调度系统全部上线，覆盖率达100%。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全国有3.3万名执行干警使用“智慧执行”App，共办理案件136898件、召开远程视频会议和案件专题讨论9000多场。其中，最高法执行局发起会商205次，各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分别使用680次和2840次，基层法院使用3500多次。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的一起经济纠纷中，江西某酒店应向贵州某信托公司支付6776万元及利息。因被执行人未履行调解书中确定的义务，信托公司向案件执行所在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因酒店仍被所谓的承租人、债权人、承包经营方等案外第三人强制占用营业，情况比较复杂，江西高院运用智慧执行指挥系统远程指挥，调配执行局和法警总队、上饶公安特警、当地派出所民警、交警共计100多人组成联合清场行动组，经过近5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强制清场，打出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声威。

智慧执行系统的应用破解了执行难点，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去年1月20日至3月初，浙江法院通过智慧执行沟通当事人11.88万人次，发送文书4.18万份，结案2.62万件，当事人足不出户领取执行款2.73万笔，金额合计28.19亿元。

安徽法院加大移动执行App应用力度，开通账号3259个，应用40578人次，办理执行案件746件。

北京法院通过建立不动产线上查封系统，成功查控各类房产7139套；探索利用机动车道路停车信息查找车辆办法，与市交通委启动技术对接，目前成功查封京牌小客车10018辆，办案时间节约一半。

“智慧移动执行系统可对全国各级法院充分发挥临场指挥和统一调度功能，视频画面清晰，信号传输稳定，助力圆满完成执行任务。”最高法执行局相关负责人说。

线上解纷

徐某某、葛某某夫妇向陶某借款100万元，未按照调解书确定的期限还款，陶某向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法扣押徐某某名下重型罐式半挂牵引车一辆。

2020年2月13日，被执行人徐某某接到襄阳市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采购防疫酒精的委托，遂向法院申请解除车辆扣押。为了让酒精罐车早日驶上战“疫”一线，襄州区法院核实情况后特事特办。执行法官迅速启动网上办案模式，经与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反复沟通，申请执行人陶某同意解除对罐车的扣押，次日双方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在安徽，滁州法院首次利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平台召开网络债权人会议，审理涉案金额5.7亿元的滁州万联置业执转破案件；马鞍山法院则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实现“僵尸企业”某高压电气公司的“腾笼换鸟”，释放土地26.27亩、厂房11282平方米，盘活企业资产2300余万元。

全国各级法院注重强化善意文明执行，加强执行工作的规范化和精准化，既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也保障了民生和就业，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执行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法院主动作为，不断创新执行工作模式，综合运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现执行信息化“法院专网+互联网”的全覆盖应用和管理。

最高法执行局相关人员透露，“智慧执行App当事人端”已经上线，提供“一站式”服务，促进了执行公开力度。

嘉兴检察当好民营企业“老娘舅”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钟华　吴攸

“检察院微课堂正式上线！”近日，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在市企业服务综合平台正式开设民营经济法律服务课程。《法治日报》记者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平台，发现在线上课程和线下预约两个模块中，来自嘉兴两级检察院的老师从企业劳动法领域风险防范、民营企业防范虚假诉讼等不同角度，为企业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

民营经济是嘉兴的“金字招牌”，截至2020年底，嘉兴市场登记主体实有603581户，同比增长9.1%，民营企业整体持续活跃。做民营企业的“老娘舅”、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是嘉兴检察机关耕耘已久的工作。

嘉兴市检察院检察长杨劲松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说，作为“红船旁的检察机关”，近年来嘉兴市检察机关秉持为民初心，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落到实处，严厉打击侵犯民营企业权益犯罪，坚持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依法审慎办理涉企人员犯罪案件，不断出新招、出实招，为嘉兴打造“重要窗口”中最精彩的板块贡献检察力量。

护企之名强化产权保护

“今天我们来，主要是告知森马集团作为被害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听一听你们对检察机关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犯罪、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意见建议。”2019年12月17日，在上海森马产业园内，海盐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对公司品牌维权办主任说。就在同一天，李某甲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批准逮捕。

此前，李某甲未经“Balabala”注册商标所有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许可让沈某非法制造上述商标，委托李某乙、俞某等人在小作坊加工生产该品牌童装，后又单独或结伙杨某等人通过淘宝网销往全国各地，非法经营数额近300万元。经检察机关公诉，李某甲等8名被告人分别被法院依法判处4年至7个月不等有期徒刑（**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并处罚金65万元至两万元不等。

在嘉兴检察近日开展的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三·四”主题日活动中，有企业家代表提出：“创新是企业的灵魂，希望政府、检察机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守住企业的灵魂。”

嘉兴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沈小平介绍说，为了全方位构筑保护网络，不断强化产权司法保护，嘉兴检察机关成立了全国首个集成智能家居知识产权保护检察实践基地，试点知识产权检察职能统一集中履行工作，签署《关于推进知识产权多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办法》等。

知企所需精准法律保障

“发现上司、同事、下属挪用公款怎么办？”在桐乡新凤鸣集团廉洁从业教育大会上，检察官向上百名企业员工抛出这个问题。这是嘉兴市检察机关服务民营经济讲师团走进企业开展专题讲座的一幕。

去年3月，嘉兴市检察院从全市挑选30名业务能力强、法治巡讲水平高的检察官组成讲师团，在深入了解企业法治需求的情况下，提供“菜单式”服务。

知企所需，正是服务保障民营企业的关键。

“生产经营状况如何？是否有尚未解决的法律问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嘉兴检察官化身驻企指导员助力复工复产，深入了解企业运行情况和法治需求。

据了解，在不断推进“走出去”寻访企业法治需求的同时，嘉兴检察机关依托检察开放日、检企共建等各类活动，将民营企业家“请进来”。

年初，经嘉兴检察院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依法改判一起涉案金额365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为持续6年的纷争画上句号。陈某所在的药业公司作为卖方，终于拿到买方尚未付清的1250万元转让款及相应滞纳金。

“今天来不只是感谢，案子刚判决下来，后续有些法律问题还要向你们咨询。”近日，浙江某药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来到嘉兴市检察院，送上一面写有“精准监督 彰显检察担当　履职尽责护航民企发展”的锦旗并向检察官进行咨询。

授之以渔助力合规建设

“一听二看三评议”，是平湖市人民检察院助力企业合规的一剂良方。

办理某涉民营企业案件时，平湖市检察院邀请人大、政协、工商联负责人和商会、民营企业家代表，通过“听案件事实、看补证材料、讨论评议”的方式全程参与羁押必要性审查，将检察听证作为检察机关助推民营经济合法、合规发展的重要载体。

“每次来检察院参加活动，都能看到又新又好的做法。”一名企业家说，以听证员身份参与案件评议，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也接受了警示教育，很有启发意义。

而做好“后半篇文章”，是桐乡市人民检察院给出的答案。

2016年末，桐乡某地卖蚕丝绵的门市部出现一批回潮率和含油率指标异常的蚕丝绵。经查实，这批蚕丝绵系两名犯罪嫌疑人通过添加甘油加工出的伪劣产品。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桐乡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并被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

案件办理后，桐乡市检察院走访了20多家涉案企业以及蚕丝绵生产龙头企业，及时向质监部门提出加快蚕丝绵行业标准制定的意见建议，最终推动国家FZ/T41005-2017蚕丝绵行业标准颁布实施。“我们不仅要帮助企业合规，更要保障蚕丝绵这个古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此案承办检察官说。

除了办案，类似行动也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发布《服务民营经济白皮书》，提示运营风险；联合嘉兴市公安局、市邮政管理局推进邮政快递行业打击毒品犯罪工作；依托工商联新媒体平台开展网上法律咨询、定期推送嘉兴检察精品法律课程视频；携手“滴滴出行”向全市滴滴网约车投放司乘管理法治语音播报；拍摄并上线检察公益广告，提示企业返岗复工政策需求点。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通过办案挽救企业，不如助力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合规建设，推动民营经济主动防范法律风险。”沈小平说。　**本版制图/高岳**

永川检察小案大治守护百姓脚下安全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彭　静　李柏阳

“我们共同推进的‘721’窨井盖快速维修管理机制运营良好，窨井盖如果被盗或被损坏将以最快速度修好，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近日，为落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我为群众办实事”相关要求，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和永川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开展窨井盖治理情况检查。检查过程中，永川区市政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满怀信心地对检察官说。

什么是“721”快速维修管理机制？为什么要开展对小小窨井盖的检查？这还得从一起小案说起。

2020年11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四号检察建议后，永川区检察院受理重庆市首例盗窃窨井盖案。犯罪嫌疑人喻某因为打游戏缺钱先后5次盗走120多块窨井盖。承办检察官了解到，窨井盖被盗并非个案，被盗单位有苦难言。

“一块重型铸铁窨井盖价值90元左右，一般盖在雨水沟上，被盗后会危及过往行人的安全。”被盗单位——某民营建筑公司工作人员说，厂区道路上的窨井盖已是第三次失窃，每次丢失后公司都会及时补装，但过段时间又会被盗。

窨井盖虽小，但是管不住这张“吃人的嘴”，老百姓的脚底安全就无法保证。如何将“首案”变成“首治”，对检察机关来说是问题的关键。

承办检察官认真审查案件，以涉嫌盗窃罪对喻某提起公诉，又联合公安机关追回100块被盗窨井盖，发还被盗单位。同时主动查找问题，走访相关主管部门。

“我们及时向永川区市政管理部门通报案情，院领导主动上门走访，宣传四号检察建议精神。经过积极沟通，市政管理部门建立了‘721’窨井盖快速维修管理机制。”永川区检察院检察一部主任冯斌介绍说，“7”即建立市政工作人员、城管队员、环卫工人、停车管理员和12345、12319及市民投诉热线7个渠道发现问题；“2”即发现问题两个小时内向维修单位派遣工作单；“1”即工程量少于100平方米的要在1天内完成维修。

除此之外，永川区检察院还与市政管理部门共同想办法，参照其他地方先进经验建立数字化管理机制，将窨井盖全部录入，实行寿命化管理；建立保险机制，对窨井盖加装防坠网，织密保护网；建立防盗机制，加强巡逻检查，将老式窨井盖换为新式窨井盖。

据永川区市政管理部门统计，“721”窨井盖快速维修管理机制建立以来，已更换、维修窨井盖100多块，确保窨井盖不缺失、不残缺，及时补、及时换。

“检察官，你们来了几次后贼娃子不敢来了。现在还有市政人员巡逻，窨井盖坏了可以随时维修。”回访当天，在某案发现场，管理人员老谭热情地向检察官介绍情况。

“感谢检察机关及时通报案情，让我们对四号检察建议、对窨井盖缺失造成的‘吃人’现象都有了更深了解。我们将压实安全责任，推动创新管理，也希望你们多提建议，共同管理好窨井盖。”永川区市政管理部门负责人说。

冯斌说，永川区检察院将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管理机制和办法，推动窨井盖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同时，举一反三，办理好其他针对隔离护栏、消防设备等公共设施的违法犯罪案件，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问题治理。

贵州首份全程无纸质材料卷宗诞生

本报讯　记者**王鹤霖**　通讯员**王再敏　简俊**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人民法院龙溪法庭近日办结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共形成41页电子卷宗，归档时没有一张纸质卷宗，无纸化转化率达到100%。至此，贵州省第一份全程无纸质材料的卷宗诞生。

此案中，原告通过“贵州移动微法院”向法庭申请立案，法官立案后联系双方，得知原告因病住院，被告在贵阳务工，在征求双方同意后，使用“掌上法庭”主持调解，在双方都不用到庭的情况下，快捷地办理了案件。通过无纸化流程操作，法庭不用形成大量纸质诉讼材料，书记员只需通过办公系统就可以将案件电子卷宗“一键归档”。

据了解，作为2021年贵州省法院无纸化办公办案试点法院之一，余庆县法院自3月1日在全省率先启动案件全程无纸化流程以来，截至3月31日，已有520件民商事案件通过无纸化全程流转，大大超过当月该院民商事案件结案数，办案效率提高，有效减轻了一线办案干警的工作负担。

上图为余庆县法院工作人员制作首份全流程无纸化案件电子卷宗。